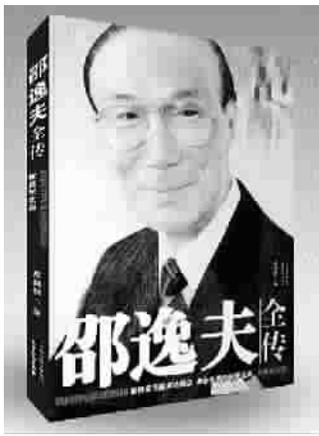


## 邵氏兄弟和“天一影片公司”(2) ◆ 詹幼鹏



邵氏兄弟的“天一影片公司”，在上海闸北的横浜桥正式挂牌开张

上海，成了电影传入我国的第一站。

电影这门现代艺术，从它的发明到正式问世，虽然经历了近半个世纪漫长的历程。但是在它获得成功的第二年就传入了我国，在1896年的上海《申报》上就见到了它的广告，这实在是个奇迹。可见邵逸夫也真是生逢其时，让他有幸成为我国最早的一批电影观众。

自从上海滩有了电影之后，邵逸夫读书的兴趣就在渐渐降温。只要一有时间，他就往那有限的几家放映场所跑，几乎成了那里的常客。一种天生的热忱，让他对这门艺术情有独钟。不过他那个时候，并没有想到去拍电影，更没有想到自己在未来的人生中，能以此奠定自己的身价，以此名扬海内外。

虽然邵逸夫没有想到要拍电影，但当时在上海滩，还是有人想拍电影。这个人不是别人，就是他的大哥邵醉翁。

自从电影传入上海之后，邵醉

翁的“笑舞台”的生意就没有那么火了。许多市民的兴趣都让这种新鲜的洋玩意给吸引过去了。这时，邵醉翁就想到了自己是不是也来搞一搞这种东西，和外国人争一争。他在惊叹之余，马上去打听电影的知识，把它当作一个有利可图的行当！

邵逸夫的大哥邵醉翁，本来就十分喜爱戏剧艺术，常常自己写个剧本，让家里养着的演员排演，然后到他的“笑舞台”去演出。自从接触到电影之后，他就开始筹划，想自己拍电影了。但是，他想到自己只是一个爱好者，并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。要想拍电影，必须找一位懂行的洋人合作。

1902年，邵醉翁终于找到了一位叫列文的美国人，和他达成了协议。当年，他们就联合拍摄了一部叫《慈禧太后》的影片。《慈禧太后》应该是我国拍摄的第一部影片。虽然同美国人合作的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，不能称之为中国的“第一部”电影，但是，却在我国电影界开创了中外合拍的先河。

中国人自己独立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《定军山》。这是一部舞台艺术片。它的诞生地并不是在上海，而是在当时还是清王朝的都城北京；它的制作者也不是邵醉翁，而是一个叫任景丰的沈阳人。

1892年，任景丰在北京开了第一家丰泰照相馆。由于他照相的技术高超，设备又比较先进，生意很是不错。在北京多年，也算是“老北京”，很有名。当电影传到北京之后，他又于1902年开办了一家“大观楼影戏园”。这家影戏园，是当时北京城最早放映外国电影的场所之一，生意很是红火。

在经营放映业的过程中，任景

丰感到这些进口的外国影片不但价格既昂贵，而且还货源紧缺，常常断档，影响自己的生意。有一次，由于跑片的伙计在途中出了问题，没有及时赶上放映的时间，让那些等候在门外的观众大发雷霆。这些人在盛怒之中，砸了戏院前面的招牌，差一点儿把任景丰的影园子给砸了。出了这次变故之后，任景丰就突发奇想，要用自己手中的照相机去拍电影。

这位任景丰实在不愧是个条东北汉子，一旦动了这个念头之后，果然一发不可收，真的干了起来。他想到北京人都爱看京剧，而当时京城中的谭鑫培风头正劲。谭鑫培是我国京剧“谭派”的创始人，人称“小叫天”。当时，凡是主演他的剧目，只要是挂了他的牌子，都会场场爆满，很是卖座。于是，任景丰就和谭鑫培商议，想把他主演的传统剧目《定军山》拍成电影。

在此之前，任景丰多次为谭鑫培拍过剧照和定装照，两人私交也不错。这位京剧大师一听，就在一阵爽朗的呵呵大笑声中答应了。果然事从人愿，在谭师傅的大力支持下，任景丰终于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电影——《定军山》。

《定军山》是我国第一部电影，也是第一部舞台艺术片。

这部由中国人独立拍摄的第一部“默片”（无声电影），终于在1905年秋天在北京上映，从而成了当时中国娱乐圈的一大新闻。

在上海的邵醉翁虽然没有独占鳌头，获得“第一”的殊荣，但是，他却开风气之先，第一个涉足此道，为中国的电影事业起到了发轫和奠基的作用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正是由于他的造就和培养，才有了后来我国

“电影大王”邵逸夫的辉煌业绩，才有了后来名扬中外的“邵氏影片公司”，才有了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 and 繁荣。所以邵醉翁功不可没，不愧是名副其实的“邵老大”。

时至二十世纪，中国的电影业已脱颖而出，上海滩的电影业更是方兴未艾。“明星”、“长城”、“亚细亚”、“民新”、“大中华百合”、“神州”、“联合”、“大陆”、“昆仑”等大大小小的十几家制片公司，几乎是一夜之间冒了出来，日日夜夜地制造中国人的“梦”。

1923年底，“明星”影片公司推出长片正剧《孤儿救母记》之后，引起轰动，大赚其钱，邵醉翁对此不得不心动。于是他便和二弟邵村人，三弟邵山客急忙商议，决定也创办一家影片公司。

1925年6月，邵氏兄弟的“天一影片公司”，在上海闸北的横浜桥正式挂牌开张。在隆重的剪彩大典大会上，风度翩翩的邵醉翁容光焕发地说，我的影片公司之所以要取名“天一”，就是要敢为人先，争做天下第一，决不做第二。

针对当时的电影业“欧化”、“西化”的势头，邵醉翁就公开宣称，天一影片公司的宗旨是“注重旧道德，旧伦理，发扬中华文明，力避欧化”。这种符合当时国情的提法，顿时博得满堂喝彩，一片掌声，同时也得到了社会的一致好评。

天一公司从成立的那一天起，就是一个家族式的影片公司。除了演员队伍是由原来“笑舞台”文明戏演员为班底组建起来的外，其他的要职人员都是由邵氏兄弟分担。老大邵醉翁亲自担任总经理兼导演，二弟邵村人任会计兼编剧，三弟邵山客任发行部经理。这时，只有六弟邵

逸夫还在“青年会中学”读书，是一名中学生。邵醉翁知道这个“老六”已经无心读书了，对电影这个新鲜行当又特别感兴趣，本来也想把他拉过来，给他一个头衔。但是，考虑到父亲邵行银的一片苦心，时下还不敢轻举妄动，就让他一边读书，一边熟悉一下这个行当，搞搞外埠发行。

真是“上阵全凭父子兵，打虎还须亲兄弟”——邵老大一声令下，邵氏兄弟的天一公司就正式挂牌运作，开始拍片了。天一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《立地成佛》，由邵村人、高梨痕编剧，邵醉翁导演。影片讲述了一个无恶不作的军阀，在其爱子被打死后，得老僧指点，遣妻妾，散钱财，大彻大悟，放下屠刀，遁入空门，削发为僧，终于真的修成正果，立地成佛了。邵醉翁力图以人的“生、老、病、死”和“杀、盗、淫、妄、酒”五戒为戏剧的核心，指点人生困惑。

这是他们的创业作，也是他们的奠基作，还是一部体现天一公司的“注重旧道德、旧伦理”的代表作。《立地成佛》拍成之后，原准备当年中秋节由上海中央大戏院上映，但由于和明星公司的影片映期冲突，只好推迟至1925年10月22日首映，针对当时追逐欧化时尚的社会风气，特别打出了宣传“天一公司”宗旨广告语——“本片注重旧道德，旧伦理，发扬中华文明，力避欧化”。《立地成佛》的放映期尽管延迟了，但是一上映便大爆冷门，盛况空前，让天一公司一炮打响。这部影片花了邵家2000块大洋，但就是这白花花的2000大洋，却像雪球一样，滚出了邵家不可一世的电影事业！

## 爱：外婆和我

殷健灵



亲爱的孩子：首先我要告诉你们，这不只是一本写给孩子的书，我更愿意你们和父母，以及(外)祖父母一起分享。这是我第一次真实地叙写自己的生活，也是第一次如此完整地记录外婆和我的故事。

## 1. 没有外婆的日子

我在四十三岁的时候没有了外婆。

有些人在很小的时候就没有了外婆，同他们相比，我也许算幸运的。但是我很贪心，贪心到以为外婆会一直这样健康地活下去，她会永远和我在一起。

没有外婆的日子，我和妈妈的世界空掉了。不再有人每天像影子一样粘在妈妈身后，依赖她，要她照顾；当我出门的时候，不再有人颤颤巍巍跟到门口，朝我挥着手像孩子一样地说“再见，早点回来”；回家的时候，也不再有人坐在沙发上，巴巴等着让我抱一抱。

很老很老的外婆，是我和妈妈共同的孩子。很久以后的一个周末，爸爸包馄饨。他像往常一样包了五十多个，等到下馄饨时才想起，把外婆的那份也算了进去。但是喜欢吃馄饨的外婆再也吃不到爸爸包的荠菜肉馅馄饨了。

外婆走后，仍然能感觉到她的气息，在房间的每个角落、每一寸空气里。她的薄羽绒外套上还留有她的体温，楼梯的拐角散落着她细软的白头发。我穿着她的衣服扫尘，细心地捡起她遗落的头发，把脸埋在她用过的盖毯里深深地呼吸——夹杂着中药的苦味和淡淡的樟脑味，是外婆的气味，嗅到它仿若抱住了外婆。只是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那气味终有一天消散，我又到哪里去找我的外婆？

外婆离开的当天，我收纳了一只盒子。盒子里的每一样小东西都和外婆有关：两颗黑糖话梅。是从外婆的外套口袋里取出来的——没牙的外婆喜欢吃糖，衣服口袋里总要塞上几颗，对她来说，若能随时摸到口袋里的糖，听到糖纸窸窣窣的声音，就会感到满足和幸福。

两枚戒指。她时常轮换着戴，其中一枚是我从俄罗斯带回来的琥珀戒指，去世前的一

段日子，她的手时不时水肿，有一回，我费力地用了肥皂水才将它从外婆的手指上取下。

一串古董珠子穿的手链。好友小鹞亲手做了送她的，爱美的外婆天天戴着。两团用过的餐巾纸，她塞在饭桌前的抽屉里，忘了扔掉。她戴过的绒线帽，里面有很多根她的头发。

几张用花格子手绢包着的纸币。好多年前，已经不再自己花钱的外婆对我说：“身边没有钱怎么行呢。”她用小手绢把两张一百元的纸币包好，有时贴身放，有时放在枕头下，倘若那纸币找不着了，我便在她不知晓的情况下，补上两张相同面值的，她从未发现过。

一根红色的磁疗项链。我从日本给她带回来的。外婆去世之后，我亲手从她脖子上取了下来。还有一块手表。外婆日日不离身的，哪怕看不见上面的指针，也要时常抬起手腕来瞧一瞧的……

这些小东西并不值钱，却是外婆的气味、外婆的皮肤、外婆的目光、外婆的心心念念。外婆刚去世的几日，每天悲伤得无法入睡。我取来那只盒子，放到床头柜的抽屉里，如此，仿若外婆重回身旁，终于踏实地睡了一夜。

从未像现在这样不时地泪水盈眶，那些浓得化不开的悲伤，比天空还要大的悲伤，覆盖了我。一个人开车的时候，我故作轻松地对空空如也的后座说：“外婆，我们出去兜风啦！”多少次，外婆坐在我的后座，兴奋地说：“开心啊，开心，我家灵会开车，想到哪里就到哪里。”我开着车，驶过我和外婆熟悉的路。风很熟悉，云很熟悉，江水很熟悉，房子很熟悉。外婆的气息包裹着我，尽管我触摸不到她。

妈妈告诉我，她每天无时无刻不在想外婆。早晨洗脸的时候想，吃饭的时候想，去上厕所的时候想，看电视的时候想，喝咖啡的时候想，吃点心时候想，洗脚的时候想，临睡前想，半夜醒来的时候想……几乎所有的生活细节里，都充斥了外婆的影子。她无法和别人提到外婆，一提，就泣不成声。妈妈说，好多人无法理解我们的悲伤。他们说，外婆九十九岁高龄离世，是喜丧；他们说，九十九岁很老了，老得足可以无憾地离去，活着的人也无憾，更何况，外婆离开时那样安然，没有痛苦。可是，我们为什么还是那样悲伤？

## 25. 官军已经出动

随后便是众大吏官员的觥筹交错，段光清看着他们谈笑风生，不由感慨，毕竟他们久经沙场，即便临到明日血流成河，现时照旧谈笑风生。可是他们如此骄横的气焰神情，却与当日干总把出兵时候的模样，有得一比。

忽有侍应轻步过来，对段光清俯身低语道，外边有要事急报。段光清遂悄悄起身出门，却是衙内胥员，他告知说，邱隘乡有一地保，刚刚赶来，说有紧急事情，非要亲自县太爷不可。段光清愣怔一下，问是什么事情，胥员回说，那地保定要见了县太爷才说。段光清沉吟半晌，忽然说道：“没看见我现时正忙着么。让他等着，不要走开。”

回到座上，段光清又沉默一阵，然后便随知府大人之后，以地主之谊，向各位大人频频敬酒，趁人不注意又似慌不迭的，些许的酒水还洒在了衣襟上。酒席散时，那胥员又来告诉，说地保称有紧急事情，立即求见大人。段光清浑身的酒气，舌头硬地说道：“那、那、那好，让他、他不得走开，不得走开，我马、马上……”

天光放亮。盛塾桥上上一应人众忙乱操作了半夜，等到这对决杀戮的一刻就要来临时，还是紧张得不能自持，一边手忙脚乱地最后检查着牵系在桥栏上的竹索麻绳，一边又与桥下的筏工日爹操娘地互相责备和关照。

周祥干和张潮青、俞能贵，站在桥顶朝西翘首张望。总算看见了！不是官军的船队，是远远的两股黑烟，袅袅升起，随即散漫在天空之中。周祥干、张潮青、俞能贵心口骤然砰砰的恰似擂起鼓来。只有他们几个晓得，这是他们与李芝英约下的暗号，当然其中还有张炬来回奔走的辛苦。此刻信号报来的消息是：官军已经出动，并且果然是兵分水陆两路！

周祥干遂从地上抓起那面杏黄描红的社戏旗，两手握紧了，呼啦啦挥舞了起来，紧接着，张潮青、俞能贵对着秀才拜了一拜，分头从两边飞奔下桥去了。

埋伏在两岸芦苇草从和一夜之间用“狼筈”新做成的“竹林子”里，众多发辫盘顶、布带系腰、面色紧绷煞白、眼珠子瞪直的乡民脚丁，喘气就愈加的粗重急促了，手里的竹篙脚

把都擦出了汗来，芦苇丛也一并地簌簌直抖。都晓得今日的事情就是鱼死网破；死也在当下，活也在当下！

此刻看见远处黑烟冒起，“烧起来了，烧起来了！”众人里立刻传遍，说那是官军一路烧杀奸淫过来了！接着又看见了桥上那面大旗的第一通挥舞，知道这是传报消息：官军马上就要杀到了！

北面大路两边的稻田，正起堰灌水。田陌中，间或有些竹林树丛。一段路面上，忽见竹枝枯柴堆集，狼藉一片，唯留出边上一条供人行走的窄道。因为皆已听着了风声，到了此刻，路上也是空空荡荡，哪里还有人影。

这时候，俞能贵一边跑过来一边掏出怀里的铜锣，“当当当当”惊心动魄地敲响来了！

半夜里来此“羊侯庙”、“拜经堂”和“东亭庙”藏身的持械乡民，刚刚看到西头有浓烟腾腾，正惊悚间，阿贵一路跑到近跟前，一边气喘吁吁，一边扯破了喉咙地喊：“贼娘的官军杀、杀过来了……他们见房子就、就烧，见、见男人就杀，见女、女人就、就奸呀！”众人一听，顿时浑身出汗，头颈发硬，眼睛都直了。

段光清在东门外的大码头处，安排输送船只起程。每当一条船挤挤地登上二十来个嘻嘻哈哈、骂骂咧咧的兵丁之后，船工即用竹篙将船撑离埠头，船老大则在后梢摇橹。看着一片乱哄哄赶会一般的场面，段光清后来就在当日笔记中写道：“此皆脚乱手忙，亦非取胜之道。”最后是庆大人带着随从，由知府毕大人陪同上了一条大官船。孙大人则留在城里高卧休憩，只等届时官军割乱平暴的捷报传来。另一边，由副将张蕙与参将薛允成骑着高头大马，率领着百余个骑兵和百把个步卒，走江厦街，又过桥踏上了后塘河北面的石板路，往东开进。

目送船队离去，段光清刚刚离开埠头回身上坡，忽然就听见有人“哟！哟！”的小声惊呼，回头看时，正见隐约是后塘河南岸河滩地方，凭空冒出两股黑烟来！段光清顿时收住了脚步，目光骤然锐利……再眺望那业已远去的船影，段光清心里只觉得七上八下。他思忖了片刻，即令去江边备船，他要去到那冒烟之处，探查个究竟。

## 鄞变一八五二

徐牲民

